

【理论探讨】

# 比较视野下东西方社会主义观： 体系、起源与生成路径

黄 斐

**【摘 要】**在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东西方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两种典型的解释体系——苏联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二者在基本内涵、总体原则、政策主张三个层面形成了两种阐释模式。这两种社会主义观的形成,与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和双重意蕴紧密相连:“乌托邦主义”分化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流派表现出同质和异质的二重性,这使它们融合孕育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天然地具有双重基因。世界社会主义的多样化生成路径,是在社会主义双重基因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政治结构、阶级关系和思想观念四重维度在不同时空综合作用的结果。沿着这一路径,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将引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新航向。

**【关键词】**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黄斐,女,福建宁德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33~41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理论维度下的英国新左翼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9CKS031)阶段性成果。

自社会主义产生以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出现过诸多争议。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社会主义在成为制衡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的同时,也成为一个颇具争议性的概念。这个过程中东西方形成了两种典型的解释体系——苏联社会主义<sup>①</sup>和民主社会主义。二者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路线方针等方面皆有不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也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对基础理念理解的分歧,造成东西方学界至今在探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关问题时,仍时常出现话语交流的困难。而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巨大差异,深刻影响了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也与此紧密相连。21世纪的世界虽然已发生巨大变化,但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和质疑中澄清社会主义的相关问题,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依然是时代课题。本文尝试以东西方社

会主义观的差异性为切入口,分析它们在基本内涵、总体原则和政策主张上的体系区别,进而从理论渊源与历史条件的互动演进视角探讨差异的形成机制和内在动因,并进一步分析发展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国范式,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多元发展提供一种分析阐释路径。

## 一、东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的两种解释体系

苏联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20世纪的两大社会主义潮流。在东方<sup>②</sup>,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建立,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制度现实的飞跃。在其影响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一度高涨,共同构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奏鸣曲。到20世纪中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冲破了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秩序,动摇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而在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是20世纪以来长期占据主流的左

翼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西方社会民主党<sup>③</sup>上台执政,使战后西方资本主义融入了浓厚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自19世纪末以来经历了“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其中20世纪中叶至90年代前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其发展史上特征最为鲜明、实际影响最大的版本,因而最能代表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核。作为20世纪典型的社会主义阐释体系,苏联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基本内涵”“总体原则”“政策主张”三个层次呈现出明显差异。“社会主义”的不同内涵构成了这两种理论体系的基石;二者围绕基本内涵形成了各自的总体原则,包括指导思想、基本路线、最终目标等;这些总体原则通过政党、组织进一步外化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政策主张。以上三个层次依次向外辐射共同构成了理论体系结构。理论体系的形成是个动态过程,当理论作用于现实后,实践反过来又使社会主义理念得到调整和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便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确立的。

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列宁时期,确立于斯大林时期。尽管斯大林时期及之后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一些方面与列宁主义,尤其是列宁晚年的思想相去甚远,但总体而言,列宁主义基本上奠定了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这一体系认为,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一种制度形式,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围绕“制度替代论”的社会主义内涵理解,这一体系形成了几个总体原则: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列宁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新发展。此后,列宁主义成为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明确指出,“联共(布)过去和现在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为指南”<sup>④</sup>。二是以革命斗争为主要路线方针,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居于主导地位。“无产阶级革命底胜利,无产阶级专政底胜利,若没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便是不可能的。”<sup>⑤</sup>三是

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述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时,将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列宁将社会主义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sup>⑥</sup>。从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就专指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在总体原则的指导下,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鲜明的政策主张:第一,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推行指令性计划经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生产资料公有化“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sup>⑦</sup>。在实践中,苏联在所有制结构、经济管理和工农业发展战略等方面形成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第二,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sup>⑧</sup>。第三,在社会文化上推行一元主义,思想、意志等主观条件的重要性被大大强化。后来的苏联领导人虽然在不同时期对这些理念进行过部分调整,但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个大框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在很长时间里都深受这一阐释路径的影响。

作为与苏联社会主义相对的理论体系,民主社会主义在19世纪末经由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斯坦的理论化,到20世纪中期成型。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制度替代论”,民主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的内涵理解为以“民主”为核心的一系列价值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民主”。<sup>⑨</sup>围绕“民主”,形成了“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sup>⑩</sup>三大基本价值导向。由“制度替代论”向“价值目标论”的转变反映的是西方社会民主党对社会主义正当性来源的认识变化。民主社会主义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信念,认为社会主义的正当性主要源自其伦理正义性。基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内

涵,民主社会主义的总体原则包括:其一,指导思想多元化。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声明》就试图以“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sup>①</sup>的目标来淡化政治信仰的重要性,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更明确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sup>②</sup>。其二,以渐进改良为主要路线方针。在社会党国际的重要会议声明中,社会主义都被视为追求实现基本价值的长期、持久的任务。其三,以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为最终目标。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再是通过革命性飞跃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是对社会实行“全面民主化”。

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西方社会民主党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它们的共同特征包括:第一,在经济上放弃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实行混合经济制度,主张运用宏观调控政策来保障分配公平;第二,在政治上推崇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主张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第三,在社会政策方面推行福利制度,国家保障公民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权益。一言以蔽之,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是混合经济体制、政治自由主义和福利社会建设的结合。西方社会民主党曾将共产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社会党国际前主席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曾表示“划清同共产主义的界限成为战后社会民主党自我表述中决定性的准则”<sup>③</sup>,这里的共产主义指的就是苏联社会主义。1956年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伦敦会议的《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声明》宣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sup>④</sup>。在历史演进中,民主社会主义已演变为资本主义秩序内的一种社会调节方式而不再追求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在改造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民主社会主义也被其反向改造,最终融合进了资本主义体制中。

## 二、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与双重意蕴

苏联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历史上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社会主义在历史中为何走向分野?传统观点将之归结于第

二国际的分裂,认为第二国际内的右派和中派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走向改良主义、修正主义。而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解释体系中,第二国际内左派的革命主张不适用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内部的修正主义。”<sup>⑤</sup>如果我们深入到社会历史的深处,会发现:与其说第二国际的分裂是东西方社会主义分野的原因,不如说是其结果。有学者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解释了社会主义的多元化发展,提出“进入‘世界历史’中的各不同地区的社会组织结构的特点以及它们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使社会主义借以发展和发挥作用的条件必然彼此相异,甚至大相径庭。这便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随着发展不可抗拒地走向多样化的客观根源”<sup>⑥</sup>,社会主义运动是“总的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它在影响历史的同时,也在历史的影响下本质地改变着自己”<sup>⑦</sup>。这一视角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分野的深层原因很有启发,同时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客观基础以外是否存在其他向度的重要原因?向源头追溯,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和内涵演变从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

如果说人类思想史上存在几个最为难解的词语的话,“社会主义”应是其中之一。曾有研究者统计过,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大概有500种以上。在各种不同的定义中,我们鲜少发现从与“共产主义”的对比中看“社会主义”的内涵。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一直以来被视为正统观点,所以对这两者的关系研究长期以来并没有被特别重视。事实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概念内涵及其关系在20世纪前曾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大体形成了“乌托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尽管我们现在常常把《乌托邦》一书的问世看作近现代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但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的概念,“社会主义”一词到19世纪初期才正式出现。由于生产力与阶级发展的局限性,19世纪以前为无产者呐喊的有识之士

虽然批判私有制,但他们的认知常常带有浓厚的封建或宗教色彩,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多停留于感性层面。后来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概念在这一时期处于一种混沌的、尚未成型但即将破土而出的状态。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19世纪以前的反资本主义思潮和运动,可以被称为“乌托邦主义”。19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阶级矛盾日趋激烈,终于使“乌托邦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流派。据考证,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一词首次出现在1832年法国圣西门派机关报《地球报》中,之后在欧美地区流行起来。“共产主义”一词最初则主要在19世纪30年代巴黎的某些秘密革命社团中使用。<sup>①</sup>由于对资本主义的共同批判态度、对建立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对集体的协作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共同追求,“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内涵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同质性,因此这两个术语常常被放在一起使用。但如果二者完全一致,为何没有成为一个统一概念?实际上,在19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通常不是同一群体,圣西门、傅立叶及其信徒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代表,而共产主义者主要指的是卡贝、布朗基、德萨米、魏特林等人及其追随者。后来他们也被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两个群体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其一,关于私有制问题。社会主义者批判私有制但不主张废除私有制,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允许私有财产的存在。而共产主义者通常明确主张废除私有制,如卡贝坚定认为根除社会弊病的办法是“消灭不平等、废除私有制和取消货币,而代之以一切平等和财产共有的制度”<sup>②</sup>,魏特林高呼“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根源”<sup>③</sup>。

其二,关于阶级认识问题。社会主义者通常没有明确的阶级属性,他们主张以阶级调和缓和社会矛盾。他们“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sup>④</sup>。而共产主义者带有明确的无产阶级属性,他们以阶级斗争理解社会关系,强调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布朗基曾怒斥所谓工资使“贫穷

和富裕、享乐和痛苦这两个平行的遗产世代相传下去”<sup>⑤</sup>。其三,关于新社会的实现途径问题。社会主义主要表现为温和的社会改良。圣西门构想中的理想社会是依靠“新基督教”协调起来的社会,社会变革“应当用和平方式实现”<sup>⑥</sup>。傅立叶的协作制度主要通过和平宣传和典范示范的办法实现,人人都“本着自愿的忠诚”<sup>⑦</sup>。相反,共产主义一般与暴力斗争、革命专政等相关联。这一特点深受巴贝夫主义的影响,布朗基、德萨米、魏特林等人也都积极参与了当时的革命运动。其四,关于依靠力量问题。社会主义的实现主要依靠有产阶级和中上流阶层的思想顿悟和慷慨相助,共产主义的实现则是依靠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些先驱中,欧文是比较特别的一位。在对待私有制的态度和阶级属性方面,欧文接近共产主义者,但在实现新社会的途径和依靠力量方面,欧文又接近社会主义者。这种特性恰恰说明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关系的复杂性。同质和异质的二重关系属性成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演变的内在基因,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中二者体现出或合流或分离的矛盾张力。

到19世纪中期,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充斥着无产阶级的头脑,在带来思想进步的同时也造成思想的混乱。出于统一思想、推动无产阶级运动的现实需求,创立一套科学的理论被马克思、恩格斯提上日程。这一科学尝试,在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革命纲领《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体现。《宣言》是一部带有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的论著,从其中对废除私有制、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等的强调,都不难看出它与19世纪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相关性。但《宣言》不仅仅体现了单一的共产主义倾向。事实上,《宣言》在社会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思想,也受到了19世纪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影响。比如圣西门已认识到经济问题对于社会的决定作用,认为“确立所有权和使它受到尊重的法令,是可以向政治社会提供的唯一基础”<sup>⑧</sup>。恩格斯曾表示,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一认识在圣西门那里已经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sup>⑨</sup>。傅立叶关于

社会历史的看法在同时代人中也比较突出,他把人类历史分成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在矛盾中运动发展的,到了文明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一切都是恶性循环”<sup>②</sup>。傅立叶还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的问题。恩格斯评价“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sup>③</sup>,并且明确表示过他和马克思“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sup>④</sup>。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得到了创造性发展。可以说,《宣言》中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社会共产主义”——在这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被融合起来。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简单地对这两种思想进行糅合,而是在融合中实现了创新和超越。对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言,“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sup>⑤</sup>,因此他们在实践中总是表现出理论的贫困。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运用于批判资本主义、关注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追求中,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才得以形成。另一方面,正是对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完成”的探索,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相关学说。这一融合创新尝试在当时有非常现实的政治考量,即团结更多力量加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到19世纪70年代,由于“社会主义”术语在工人阶级中的接受度日益提升,马克思、恩格斯也开始更多地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传播更使“科学社会主义”<sup>⑥</sup>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同义语广泛流传开来。术语使用上的变化,并不代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转变,而是因为到这一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在他们的语境中实际上已相当于“科学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其卓越的社会历史理论和剥削理论,对以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进行融合与超越后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的合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的关系二重性也使融合后的社会主义话语始终蕴含着复杂的双重基因,进而影响了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走向。

### 三、两种社会主义观的生成路径

科学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后期成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是由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它是符合工人阶级需求的理论。彼时,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尚不具备足够的调节修复能力,工人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无产阶级的战斗意识强烈,以激进手段争取政权的方式得到许多无产阶级的认可,因此他们需要有其需求相匹配的思想理论。那时,人们更关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共性,倾向于团结各种批判资本主义的力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正是以这样的面貌深植人心的。但由于社会主义话语的内在复杂基因,当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与阶级力量对比、人们的价值判断和智识水平发生变化时,社会主义话语就会发生相应转变。意识形态发展史展现的是它背后的经济社会结构史。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理论的发展、变化、分野都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思想、观念、道德等也有自身的独立性,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因此,不论是对于苏联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都要从整体基础分析它们的形成,应当关注这些变化的内在动因及生成逻辑,这也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带给我们的启示。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演变和多样化生成路径,从根本上说,是在社会主义双重基因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政治结构、阶级关系和思想观念四重维度在不同时空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西欧,社会主义是内生性的存在,体系化的社会主义理念产生于当时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无产阶级力量已经形成的西欧地区。这种内生型社会主义思想基于生产力、资本、社会政治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发展而产生,因此必然也会因应其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19世纪末,西欧发展出了繁荣的市场经济。以德国为例,1900年前后20年德国经历了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仅在1890年至1914年间德国

国民生产净值就几乎翻了三倍；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3%——由此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奇迹’时期才得以超越”<sup>③</sup>。市场不断扩大、工商业的适应能力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本主义体制危机调节的能力。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主制度也在逐步普及。与此同时，劳动关系和社会阶层结构也出现变化。工人工资提高、工作时长缩短，劳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缓和。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日易剥离，新的职业群体“职员阶层”人数大量增加，这构成了中间阶级的重要来源。这些群体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依赖性，认同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能使自身获得更好生活的观念，从而失去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性。由此，在西欧出现了由激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向温和的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转变，原本强调经济权益、主张改革的“社会主义”意蕴凸显，而强调政治斗争、暴力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蕴则不那么“火热”了。尽管第二国际曾就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展开过激烈争论，但改良主义在现实中日益占据上风，在思想上形成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

关于修正主义的含义，伯恩斯坦这样解释：“修正主义，这个基本上只有对于理论问题才有意义的词，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成为改良主义，即系统的改良工作的政策，它同把革命突变当作运动的符合愿望的或被承认为不可避免的阶段的政策相对立。”<sup>④</sup>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已具备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能力，议会民主的发展使工人阶级有机会使用合法的手段争取权益甚至获得政权，中间阶层扩大，社会并没有走向贫富两极分化。伯恩斯坦不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遥远的目标，而是一个在不断进行中的过程，“运动就是一切”<sup>⑤</sup>是他最为人所知的主张。从某种程度上说，修正主义可以说是19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理念在19世纪末的新发展。当时，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俄国等都出现了类似的路线之争。列宁也承认修正主义的出现有其社会根源，“修正主义的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sup>⑥</sup>。20世纪的民主社

会主义主要思想大多来自对修正主义的具体化和进一步阐述。当一种政治理念形成一种传统、原则和运作模式之后，就会发展出一套制度惯性。久而久之，管理调控的手段便代替了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黄金时代”的繁荣经济、“丰裕社会”和福利制度，几乎消解了民主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情绪，他们从资本主义的对立者变成了维护者，尽管他们的维护时常以批判和改革的面貌出现。

而在俄国，社会主义一开始是外源性的存在，当来自西方的先进社会主义思潮作用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俄国时，必然会产生与西方不同的化学反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西欧早期工业化基本完成、民主制度发展、阶级结构多元化、阶级冲突得到缓和相比，俄国依然是一个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虽然沙皇改革大大加快了俄国的现代化步伐，但其本质是为了捍卫专制统治阶层的利益，俄国国内经济结构和区域发展不均衡，大量阶级特权和农奴制残余仍被保留，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于困苦之中，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据统计，“1901-1904年，俄国共注册罢工者50多万人，而且罢工常常伴随着政治示威游行”，“在1905年1月至1907年6月的革命期间，共有近460万人参加罢工”<sup>⑦</sup>。统治阶级对底层民众抗争的压制进一步激发了大众的反抗意识和斗争实践，所以当人们接触到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时，天然地倾向于其中的共产主义基因。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遭遇质疑时，在东方成为落后国家借以赶超西方、克服资本主义弊端的救国良方。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俄国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sup>⑧</sup>。当内部萌生的革命意识与外来的思想理论相碰撞，便形成了俄国特殊的权威型社会主义理念——列宁主义。

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条件使列宁十分强调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对民众的社会主义意识灌输。“俄国的特点是缺乏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传统。议会政治、新闻和出版自由、自由的工会

活动几乎没有听说过。社会主义政党不能合法地工作。俄国工人的人数还很少。他们大部分才刚刚从农民转为工人,既缺乏组织经验,也没有达到可与当时的西欧工人相比的知识和觉悟水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者是农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文盲。”<sup>⑧</sup>列宁对职业革命家集团的重视、对严格的组织纪律的要求、对人民群众力量的强调等,都体现了典型的共产主义元素。列宁的思想奠定了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观的基础,也使共产主义成为共产党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鲜明特征。与西欧社会民主党不同,俄国等后发国家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彻底打碎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社会主义与民族振兴的需求紧密相连。因此后发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通常都有明确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目标,这一模式被英国学者唐纳德·萨松称为“发展型的社会主义(developmental socialism)”,它“可被描述为一种关于现代化或发展的意识形态。尽管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其实际任务包括要建设工业化的社会”<sup>⑨</sup>。为实现快速发展,在与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举国体制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20世纪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产生巨大影响,在于它拓宽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和外延,开创了社会主义与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相融合的先例,创立了一条人类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全新的社会发展道路,但苏联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体系的弊端也为20世纪社会主义的多舛命运埋下了伏笔。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新方向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遭遇重创,民主社会主义也在20世纪后期走向衰落。为谋求生存,西方社会民主党纷纷转向新自由主义,但“中间化”转型在为社会民主党带来短暂喘息的同时也使其越来越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再次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严峻挑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功。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曾深受苏联影响,这也是过去中国的

政治经济状况、社会阶级关系和思想意识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20世纪初叶的中国积贫积弱,中华民族承受着深重苦难。进步的中国人曾尝试以西方式道路救中国,然而当古老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相碰撞时产生了种种排异反应。仁人志士们虽有彻底改变社会的决心,但苦于思想迷惘而救国无门。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当时正在为民族解放找寻出路的中国人提供了全新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使人们意识到社会主义与民族振兴相结合的现实可能性。于是,先进的中国人转向了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模式都被社会主义阵营视为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亦深受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突破了苏联模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经历了从“发展型社会主义”向“共享型社会主义”的转型。中国将社会主义原则和市场相结合,在运用市场工具的同时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形成了“社会主义原则—市场—政府”三维互动的独特发展格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鲜明的共享导向,力求“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sup>⑩</sup>。从发展导向到共享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立足本土到走向世界的历程,社会主义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世界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成为代表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新方向的旗帜。一方面,它力图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受到世界社会主义浪潮的深刻影响,中国也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社会主义从一国向多国推进、从一种模式向多样化发展、遭遇发展性危机和在低潮中奋进的过程中,中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世界社会主义核心力量东移,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创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开拓了社会主义实践新道路,将引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新航向。另一方面,它力图实现中国现代化与世界发展

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sup>①</sup>。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垄断模式,宣告了西方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成功开辟出后发国家的发展新形式,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的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和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潜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发展趋势和格局。未来,中国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最可靠、最坚实的阵地,将继续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 注释:

①在国内学界主流表述中,列宁主义又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斯大林主义被基本等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由于这里所说的东方社会主义指的是从列宁时期形成,到斯大林时期确立,在斯大林逝世后长期统摄苏联,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巨大影响思想和政治体系,所以本文将之概称为“苏联社会主义”而不称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西方话语中它也被称为“共产主义”。

②马克思在谈及俄国相关问题时是将其纳入东方问题来阐述的,国内学界也多把俄国纳入“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范畴,本文是在这一语境下将俄国视为东方国家的。

③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名称多样,如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等,为行文方便本文统称社会民主党。

④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3年版,第11页。

⑤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431页。

⑥《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⑦《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3、544页。

⑧《列宁选集》第3卷,第140页。

⑨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译:《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5页。

⑩张世鹏译:《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⑪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译:《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第3页。

⑫张世鹏译:《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第70页。

⑬托马斯·迈尔主编:《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概念》,殷叙彝、张世鹏、蒋仁祥等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

⑭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译:《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第72页。

⑮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殷叙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

⑯张光明:《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⑰张光明:《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考察》,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5页。

⑱参见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何瑞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8、13页。

⑲埃蒂耶纳·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第2、3卷,李雄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13页。

⑳威廉·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孙则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83页。

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8页。

㉒布朗基:《布朗基文选》,皇甫庆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页。

㉓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2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78页。

㉔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2卷,赵俊欣、吴模信、徐知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9页。

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1卷,王燕生、徐仲年、徐基恩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1页。

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83页。

㉗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吴模信、徐知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3页。

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84页。

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7页。

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81页。

㉛在国内学界的传统观点中,科学社会主义从广义上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从狭义上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由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科学社会主义一直是作为他们学说的同义语来使用的,所以本文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科学社会主义一词的。

⑳迪特尔·海因:《十九世纪德国史》,王琼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48-149页。

㉑爱德华·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文选》,殷叙彝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0页。

㉒爱德华·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文选》,第68页。

㉓《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㉔阿·伊·杰维廖夫、尤·巴·斯维里坚科、瓦·瓦·舍洛哈耶夫等主编:《俄罗斯政党:历史与现实》,崔志宏、万冬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82、83页。

㉕《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8页。

㉖托玛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导论》,第59页。

㉗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上册,姜辉、于海清、庞晓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中文版序言第ix页。

㉘《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页。

㉙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4页。

##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Views of Socialism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Systems, Origins and Generation Paths

Huang Fei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soci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ism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formed two typical explanatory systems: Soviet Socialism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which have created two explanatory models in three respects: basic connotation, general principle and policy propositions. The formation of these two socialist view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rigin and dual implication of socialist thought. The two schools of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separated by "Utopianism" show the duality of homogeneity and heterogeneity. The homogeneity of the two socialist views is manifested in their common critical attitude to capitalism, their common pursuit for building an ideal society beyond capitalism, and their collective cooperative form of social organization, while their heterogeneity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such problems as private ownership, class understand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new society, and the supporting power.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put forward by Marx and Engels was based on combining and transcending the previous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thoughts with their excellent social theories of history and exploitation. The du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also enables the integrated socialist discourse to contain complex double genes. The diversified generation paths of world socialism are on the basis of the double genes of socialism, the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action in such dimensions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structure, class relationship and ideology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places. In Western Europe, the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of capitalism was basically completed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democratic system was gradually popularized. Class structure showe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and class conflicts were eas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there appeared a change from radical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ideology to moderately improved socialist ideology in Western Europe, forming Revisionism represented by Bernstein,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of democratic socialist thought in the 20th century. However, Russia was still a typical autocratic monarchy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ith un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harp class contradictions. Therefore, when people came into contact with socialist ideas from the West, they naturally tended to the more radical gene of communism, thus forming Russia's special authoritative socialist idea: Leninism,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of Soviet socialist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Along the generation path of socialism, China has forme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hich will lead the new course of world soc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Soviet Socialism; democratic socialism; scientific socialism; world socialism;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